

新中国 首个儿童节



1950年儿童节庆祝大会

1950年的儿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儿童节,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民主妇联等团体发出了“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的呼吁书,中国11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还专门组成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筹备委员会。

1950年6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5000多名少年儿童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际儿童节庆祝大会。苏联、朝鲜等国家的小朋友和他们的母亲也应邀出席了此次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播放了朱德向小朋友们讲话的录音。朱德情真意切地勉励说:“小朋友们!我们的国家是有悠久历史和文

化传统的国家,并且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地来爱她,爱护自己的祖国。你们现在虽然还小,但要努力学习,学会各种科学知识并把身体锻炼强壮,准备将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有高度文化的强大工业基础的中国。”

除各项盛大的纪念活动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邓颖超均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题词表示祝贺。毛泽东题词:“庆祝儿童节。”刘少奇题词:“重视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的健康。”周恩来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人民日报》还专门刊发了社论《庆祝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指出:“庆祝六一儿童节,要让凡能参加这一节日的儿童尽情快乐一天,要让全国更多的人以及父母们更多更多地注意儿童工作。”

孟红

陈云如何整顿中央特科

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中央决定他停止在上海的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陈云接替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在严重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毅然肩负起重组特科的重任。

全方位调整特科

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称“先生”。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创了特科工作的新局面。陈云从多个方面入手,对特科进行了全方位调整:

一是对人员和机构作出调整,决定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特科第四科,将通信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他三个科按照少而精的原则精减缩编。

二是改变了过去特科组织和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

隔离的状况,进一步严格明确了单线联系、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工作原则。陈云后来说:“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三是改变过去特科人员大多以挂名的虚假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要求所有人员的社会职业都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能够深入社会开展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此掩护特科工作。陈云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印刷所,名义上负责内务,“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

四是创建了商业掩护的隐蔽斗争方式。陈云花几千块钱,委托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各区办了木器店、印刷所等一二十个实体,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陈云回忆说,有了这个木器店,“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陈云“开铺子做买卖”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这个人花

了几千块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重启情报工作

在对特科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出初步调整的基础上,陈云仅用一年时间,便重新恢复建立起因顾顺章叛变而一度停顿的情报工作,先后派人打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长期在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关于这一时期特科发生的变化,一个国民党特务回忆说:“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传播真实红军

1935年5月,陈云奉命离

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工作。到达成都后,他按照行前与周恩来的约定,以“廖家骏”为化名,在《新新新闻》上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向党中央报告平安抵达成都。7月上旬抵达上海后,陈云重新启用“李介生”这个化名,设法与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云不畏严重的白色恐怖,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对外发表,他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第一次向世人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与群众间的密切关系。

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莫斯科完稿后,先后在巴黎、莫斯科、北平面世,对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事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很多国统区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

秦正

“解放鞋”的由来

华润(原名联和行)1938年在香港创立,抗战时期就开始做橡胶生意。华润人知道,橡胶可以做轮胎,也可以做皮鞋的鞋底。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前,为了后勤保障,党中央指示华润:为东北解放军准备5万套棉衣和5万双鞋子。

华润买不到棉衣,就把棉花和布匹用轮船运到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已经解放,报纸记载:十万哈尔滨市民为解放军做棉衣。

做鞋,纳鞋底,那是一个很慢也很辛苦的事情。

华润员工想到:可不可以做皮鞋?皮鞋结实,有鞋带,快跑也不会掉,而且耐用。但算下来,成本太高,而且一下子也买不到那么多皮子。老员工韦志超说:用橡胶做鞋底,没有皮子,能不能用帆布做鞋帮?

韦志超就在黑板上画鞋样。有人说:鞋帮可不可以像皮鞋那样系鞋带,而不是布鞋样露着脚背,不跟脚,跑起来很容易掉。有人插嘴说:皮鞋底很薄,踩到

水里就湿了,可不可以在鞋底和鞋帮之间,加一寸橡胶皮子。这样,遇到一般的雨,就可以当雨鞋穿。

韦志超在黑板上画图:胶的鞋底,胶的鞋帮大约一寸高,加上帆布鞋面,鞋面有扣眼,用以系鞋带。

大家七嘴八舌,不断修改设计方案。重要的是,生产速度要快,机器生产。一种全新的鞋子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华润请纺织厂织结实的帆布,请制鞋厂改进工艺。香港的制鞋厂很快做出来第一批鞋,保证了辽沈战役将士换上了新鞋。

华润订货量大,此时已经不是5万双了,要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换鞋。在订货过程中,华润说:再做一批解放军鞋。在交货时,商家就自然而然地说:这批解放军鞋做好了。一来二去,“解放军鞋”就成了鞋的名字。

“解放军鞋”后来产量大了,一部分成为民用鞋在市场上销售,人们给这种鞋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解放鞋”。

吴学先

“江郎才尽”为避祸

南朝著名作家江淹(444—505)青年时代才华横溢,后来却大不如前。据《诗品》记载,江淹在罢去宣城郡守后,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美丈夫,还给他五色笔,此后江淹便称自己“才尽”。

事实上,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江淹为避政治斗争而选择避世的深层原因。

元徽四年(476)七月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掌握了军队大权的重臣萧道成辅政,他将江淹请去帮忙,从此他的官运亨通。三年后萧道成代宋自立,开创了齐王朝,江淹成为齐的开国重臣,此后更加一帆风顺,主要的精力都用到当官方面去了,诗文创作不复措意,所以在萧齐初年,江淹已有才降之势。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齐的第二代皇帝——齐武帝萧赜(音zé)病危,王融等人发动政变,阻止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太孙萧昭业(其父太子萧长懋逝于本年正月)入

宫,打算立武帝次子萧子良。与萧赜平辈的宗室成员、顾命大臣之一的萧鸾发动反政变,强行入宫,“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此后大权全归萧鸾;不久萧鸾废昭业另立昭业之弟海陵王昭文,稍后又废昭文,自己以入继为萧道成第三子的身份立为帝(明帝)。以上这些都是在一年之内完成。之后,他大开杀戒,处决了大批宗室嫡系。

江淹没有介入其中,而是与萧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注意保持距离,因为跟得太紧也未必明智。为了避祸,于是他宣布自己做了一个“才尽”之梦,以后不能写文章了。

不动笔总是安全得多。才华横溢、“文辞辩捷”的著名才子王融二十几岁就死于他自己发动的政变之中,另一位才华横溢、“文章清丽”的才子谢朓三十几岁亦死于非命;唯有自称“才尽”的江淹能苟全性命于乱世,甚至始终不失其富贵。

顾农